

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影響力分析

楊四平

[提要] 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海外到底有沒有影響，影響如何，哪些因素制約著這種影響，是本文追問的話題。但海外何其之大，我們不可能進行定量統計分析，只能抽樣處置，擇其要端評說。

“中國學熱”既是海外中國學家與國內知識分子之間良性互動的結果，也是世界某種文化思潮、意識形態等“基礎性的影響因素”推動的產物，其影響有正向影響和回返影響。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外文學接觸和交往表現狀態各異，有社會性的、學術性的、政治性的，只有回歸文學本位，進行平等意義上的對話，才能規避誤讀，增強海外譯介的有效性。在此背景下，雖然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或因作家本人的因素、原著的思想藝術因素、翻譯版本的因素、意識形態的因素或多種因素合力作用而在海外頻頻獲獎，但並不能因此就認定中國現當代文學已經融入了海外的文學系統，我們需要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影響力這一文學熱點問題。

[關鍵詞] 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國學熱” 文學交流 海外獲獎 影響

[中圖分類號] I206.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6) 03 - 0069 - 10

一、“中國學熱”時起時伏

德國翻譯家卡爾·戴德尤斯說：“一個民族的文學是一扇窗戶，這扇窗戶讓這個民族向外觀望他國人，他國人也可以透過這扇窗戶瞥見這個民族的生活世界。”^①漢學、中國學屬於東方學的一支，與國學有同也有異，而海外漢學界、中國學界往往與中國國內的國學界有著密切的聯繫。可以說，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是海外漢學家與國內的國學家互動的結果。“利瑪竇與徐光啓，理雅格與王韜，王韜與儒蓮，伯希和與羅振玉，胡適與夏德、鋼和泰，高本漢與趙元任等等”，“戴密微在廈門大學任教，衛禮賢執教於北大講壇，陳寅恪受聘於牛津、劍橋，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雙方的交往比今天還要頻繁”。^②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那個時代是國學大師輩出的時代，這就有了中外學者交流的中方“內應”的基礎和前提；而此後，革命文化異常盛行，國學遭受了嚴重打壓，漸漸失去了與海外漢學家交流的基礎和前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那個時代海內外文化大師之間互動“比今天還要頻繁”。

有時，這種“中國熱”、“中國學熱”與世界上正在流行的某種熱潮遙相呼應。比如，1960

年代，世界範圍內盛行文化激進主義，日本、法國、美國等一批青年受此鼓舞，與中國革命青年在革命精神上聯通在一起。換言之，中國的“文革”是有世界文化背景的，就像當年的中國抗戰是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聯繫在一起那樣。“20世紀的60年代，美國青年是反叛的一代，馬克思、毛澤東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馬爾庫塞都是他們的偶像。他們之中也開始掀起‘中國熱’，搞了許多活動，美國的報章雜誌上也不乏中國的報道”。^⑤在這批激進的青年人當中，有個影響很大的文學群體，史稱“垮掉一代”。艾倫·金斯堡、蓋瑞·施耐德是他們中的傑出代表。北島在《艾倫·金斯堡》中寫道：“我和艾倫是一九八三年認識的，當時他隨美國作家代表團第一次到中國訪問。在我的英譯者杜博妮的安排下，我們在他下榻的賓館秘密見面，在場的還有他的親密戰友蓋瑞·施耐德(Gary Snyder)。我對那次見面的印象並不太好：他們對中國的當代詩歌所知甚少，讓他們感興趣的似乎是我的異類色彩。”^⑥後來，北島在《詩人之死》中又寫道：“他就是這樣，凡是跟當局過不去的、驚世駭俗的、長反骨的、六指的，還有鼻青臉腫的，統統都是他的朋友，恐怕這就是他十五年前在北京跟我會面的主要原因。”^⑦這表明，一國文學對另一國文學的影響，並非總是文學審美性影響，不少時候是政治意識形態性影響。

新時期以來，海外重新興起“中國熱”，“至今熱度仍然不斷上升”。^⑧一開始，作為新時期文藝復興標志的地下詩歌/朦朧詩，經由香港中文大學《譯叢》的發表，成為海外中國學家關注的焦點。到目前為止，在海外，朦朧詩一直是海外中國學家感興趣的話題。美國中國學家奚密說：“在國外，朦朧詩成為一個焦點有幾個原因：第一、作為官方詩歌的另類，和充滿爭議性的新詩潮，它具有象徵意義。第二、它對晚近歷史的批判性反思和對回歸人道主義的呼籲。第三、同樣重要的是，接觸和互動的機會。如果前兩個原因點出朦朧詩精神和主題的特色，最後一個因素造成的影響史是長遠的。”^⑨這進一步證明了文本以外、文學以外的因素往往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傳播與接受中扮演著不可小覷的角色。

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再次點燃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文化界的“國學熱”、文學界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央視“百家講壇”的熱播，是文化自強乃至文化自戀的強勁表現。當然，我們要謹防把這種過熱的文化自戀演變成失態的文化自大，如王小東等人在《美元是張紙》裡所張揚的那樣，從而再次拒絕外來文明，再度在封閉的世界裡夜郎自大，損己也不利人。顯然，這種新保守主義，這股文化復古思潮，與國外的“漢學熱”、“中國學熱”在價值面向上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後者是開放性、對話性和建設性的。

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的傳播與接受，除了作品本身的藝術素質外，還有一些“基礎性的影響因素”，比如“政治意識形態與文學的關係，東西方文明的交融與對抗，政府或民間交流的需要等”。^⑩具體到近幾年的情況來說，比如“當前世界似乎正在泛起的‘中國熱’的帶動效應”，再如“當前文化傳播作為一種政府行為時，作家作品的選擇就會受到過濾和篩選”，“大型的家、國際文化交流也會加速或擴大作品的譯介速度和範圍”，更不用說“國家整體實力的變化、國家間經濟、文化關係方面出現重大變化帶來的種種影響”。^⑪近年來，在國家“文化外宣”和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大環境下，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紛紛出國訪問、演講、對話和參觀。比如，2004年是法國的“中國文化年”，3月19~24日，由余華、莫言、蘇童、李銳、韓少功、格非等26名作家和六位學者組成的中國作家代表團以及由法方另行邀請的台、港、澳作家九人，在巴黎參加主題為“中國文學”、中國為“主賓國”的“第24屆法國圖書沙龍”。這些“基礎性的影響因素”是導致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傳播與接受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活躍和深入的重要原因。

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被翻譯的語種越多，作品的數量越多，重版的次數越多，說明其接受面就越廣，對其展開研究的可能性就越大。正是在海外“中國學熱”的推動下，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海外得到了較好的傳播。海外曾經出現過“魯迅熱”、“冰心熱”、“老舍熱”、“丁玲熱”、“趙樹理熱”、“張愛玲熱”、“莫言熱”等。這些“作家熱”均與相應的時期海外的“中國熱”、“中國學熱”息息相關。

當下，美國、日本和歐洲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已成為海外中國學界的顯學。“美國是當下世界漢學研究的‘重鎮’，其漢學領域作為現代漢學的源起與中心，不僅學術機構頗多，而且知名學者輩出。目前，該國關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業已從 20 世紀中葉曾隸屬於地區研究的邊緣研究，逐漸轉變並發展成為具有鮮明特色與獨立定位的專業領域，進而成為海外‘中國學’領域當之無愧的‘顯學’。該國的漢學家群體有關 20 世紀至今中國小說的研究對於‘東學西漸’與‘西學東漸’的跨文化交流而言，體現出獨特且重要的價值，進而引發了數次研討與爭鳴。與此同時，中美學界在中國現當代小說研究領域形成了共生與互動、衝擊與回應和共識與論爭並存的複雜學術聯繫，並且逐漸被納入中美文學關係、現代漢學與比較詩學等研究領域的觀照視野，進而成為了比較文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⑩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影響了海外的讀者、專家、學者，海外中國學家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成果又反過來影響了大陸學術界。這種中國現當代文學在中外文學交流中的特殊傳播與接受現象叫做“逆傳播”，這種影響我們可以稱之為“回返影響”。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看到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傳播與接受的在海外產生的影響力（正向影響），而且要看這種影響力的反作用力（回返影響）。

儘管歷史上不斷出現規模與熱度不等的“中國熱”、“中國學熱”，但是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相對於中國現當代文學巨大“存量”來說，中國現當代文學被譯介出去的作品僅僅是九牛一毛。就連當年德國的中國學家艾希，在歐洲“中國熱”的狂潮中，也能保持一定的理性，以另類的姿態和刺耳的聲音警醒大家，這種理性的態度值得我們借鑑。1925 年，艾希前往柏林大學攻讀漢學，他的這一選擇顯然與德國當時的“中國熱”有關，“然而，隨著 20 年代中期德國上空一戰陰影的漸次消散，德國經濟的起死回生，中國熱在重又喧騰的機器聲浪中已呈現出強弩之末的態勢。由此看來，艾希選擇漢學似乎有些不識時務”。^⑪1927 年，艾希撰寫了《歐洲對抗中國》，對德國著名作家激賞和膜拜辜鴻銘的《中國反對歐洲觀念的辯護》不以為然。他認為，不能把殖民戰爭簡單地歸罪於歐洲，中國自身的封閉和僵化也應該是值得反思與批判的。這表明，艾希沒有被“中國熱”牽著鼻子走，而是理性地看待“中國熱”。質言之，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傳播與接受進程中，我們應該“熱點冷眼看，冷點熱眼看”。

二、現當代中外作家交往日趨頻繁

文學接觸和文學交往是促使不同語種文學之間進行譯介的重要環節，相對於海外譯介而言，文學接觸與交往的影響更為長久。眾所周知，內山完造和他當年在上海的書店是現代中國作家與外國作家接觸和交流的重要平臺，尤其是中日現代文學交流的橋梁。1913 年，內山完造被日本公司派遣到中國來推銷眼藥水。在走遍中國大江南北後，1929 年，他在上海開辦“內山書店”。魯迅是書店的常客，常常到這裡買書、會客。內山以此為中介，通過舉辦“漫談會”等方式，促進中日文人之間的民間交流，此外，他還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為魯迅、許廣平和周建人等人提供避難的機會。後來，他出版了許多記錄中日現代文學交往事件的著作，如《上海夜話》、《上海

風語》、《上海霖語》、《上海漫語》和《中國四十年》等，留下了一批難能可貴的中日文學交流的第一手資料。尤其值得讚賞的是，他對於魯迅不遺餘力的推介，在魯迅走向世界的歷史進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比如，1931年3月，增田涉懷揣日本中國學家佐藤春夫的信函到上海訪學，經內山引薦，師從魯迅。在近十個月的日子裡，他堅持每天午後到魯迅家，聆聽魯迅講解自己的作品，對魯迅有著深入的瞭解。歸國後，他寫出了《魯迅傳》和《魯迅印象》，後者在比較文學領域裡幾乎可以與《歌德對話錄》媲美。增田涉提出的“日常魯迅”成為海外“魯學”的重要命題。此外，他說魯迅是“民間文人”，回憶說魯迅曾自稱“同路人作家”等，都是海外中國學界認識魯迅、研究魯迅的重要視角和觀點。

如果我們把以上的中外文學接觸和交往視為“社會性”的文學接觸和交往的話，那麼接下來要講到的中外文學接觸和交往就是“學術性”的文學接觸和交往了。比如，1932年，受北京大學西語系系主任溫源寧的邀請，艾克頓在北大教了六個學期的英詩和英文寫作。此間，班上有個叫陳世驥的學生自己上門拜訪他不說，還把卞之琳、林庚、李廣田等北大青年詩人推薦給他，有時乾脆就住在他家。長此以往，師徒間建立了深情厚誼，並決定一起翻譯中國新詩，這就有了中國最早的英譯詩選《現代中國詩選》。又如，1941年，英國的中國學家白恩就曾以英國大使館文化官員身份來過中國。1943年，在李約瑟的倡議下，他再度來華，在西南聯大教授英詩與海軍建築等課程，在與同事聞一多的多次接觸後，彼此間建立了誠摯的友誼。於是，倆人聯手翻譯中國新詩，這就有了中國第二本英譯詩選《當代中國詩選》的雛形。遺憾的是，還沒有等到該詩選的出版，聞一多就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了。當這本由中外學人合作翻譯的詩選正式出版時，白恩在“獻詞”裡特意寫上要把它獻給已經去世的友人聞一多，並以此向他致敬。此外，我們還可以從2008年上海書店出版的美國學者帕特麗卡·勞倫斯的著作《麗莉·布瑞斯珂的中國眼睛》中獲知如下信息：凌叔華與朱利安·貝爾之間的戀情，顯示了新月派與英國的布盧姆斯伯里（Blooms-bury）精英文化圈之間比較密切的互動；這種良性互動，除了使新月派詩人近水樓臺先得月地獲取了文學現代性意識以及強化了英國現代派作家的中國文化審美意識外，還強化了彼此之間“文化換位”的思考，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與接受培育了良好基礎。

中外文學接觸和交往除了社會性接觸交往與學術性接觸交往外，在特殊年代還出現了政治性、戰爭性的文學接觸和交往。比如，1928~1932年，作為《朝日新聞》駐上海特派記者，日本的中國學家尾崎秀實與中國左翼作家、斯諾、史沫特萊、路易·艾黎之間交往甚密。他在向共產國際佐爾格提供情報的同時，還協助翻譯《阿Q正傳》。還有，抗戰時期，中美反法西斯文學陣營遙相呼應。比如，中國創辦的英文雜誌《中國作家》發行到美國後，在美國引起了熱烈反響。在當年的《抗戰文藝》發表的一份“報告”中寫道：“1、美國作家協會來信二次，表示最大的同情，除以該會會報寄贈外，並寄來美金二元，預閱《中國作家》全年。2、美國《辯證》雜誌（*Dialectics*）轉載馬耳的《中國文學二十年》一文。3、美國‘批評家集團出版社’來函要求《中國作家》代為編輯 *New wrimincs in china* 一冊，並聲明酌送相當的稿費。4、美國的權威文學雜誌《小說》（*Story*），來函要求推薦並代譯一個長篇小說，並聲明須有‘較宣傳更豐富之材料的作品’。5、美國《今日中國雜誌》轉載《中國作家》上的作品。6、美國《活時代》雜誌推薦《中國作家》。7、美國最華貴之半月刊《新方向》，在‘文學情報’中推薦《中國作家》，內有‘中國抗戰之文學一方面，已由能運用英文著述如應用祖國文學時同樣熟練之作家們寫出英文’等介紹。”^②在歐美國家眼裡，抗戰時期的中國是一個需要被扶持的大國形象，因此，它們對來自中

國戰場上的“聲音”尤為關切。又如，中國左翼文學界與蘇聯無產階級文學界交往頗深，使得現代中國左翼文學在蘇聯得到了更為廣泛的譯介。1940~1944年間，蘇聯國家文藝出版社、蘇聯作家出版社等出版機構，以及以俄、法、德、英等多種文字出版的《國際文學》、《青年衛隊》、《文藝鳥瞰》、《十月》、《文學報》等報刊，發表了大量中國抗戰文學作品；蘇聯中國學家還編輯出版了許多中國抗戰文集。此外，當魯迅去世時，蘇聯文藝界專門舉行魯迅追悼會，法捷耶夫任主席，並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評價魯迅一生的豐功偉績。這一切均表明中國與蘇聯左翼文學界聯繫甚密。再如，中國左翼文學與日本無產階級文學之間的交往也很深。除了我們翻譯他們的作品外，他們也不斷翻譯我們的作品。1934年3月，魯迅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無情抨擊的《火》、《王道》和《監獄》在日本的《改造》上發表。同年，由竹內好與岡崎俊夫發起成立的“中國文學研究會”，先後創辦《中國文學月報》和《中國文學》等，發表許多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評論文章。1931~1937年間，日本文壇大量譯介魯迅作品，乃至有由改造社出版的七卷本《大魯迅全集》。

抗戰時期，爲了加強中國抗戰文學界與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界之間的交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舉辦各種類型茶話會、游園會和文娛晚會等，不但加深了中外作家之間的交往，而且也促進了國外作家之間的交往，使文學的雙邊接觸和交往提升爲文學的多邊接觸和交往。比如，1938年7月29日，“文協”在武漢的“法比瑞同學會”舉行茶話會，歡迎英國作家阿特麗和日本作家綠川英子，後者即興發言說：“希望中、英、日三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打倒日本侵略者。”^⑩同時，通過“中蘇文協”、“中捷文協”、“中英文協”、“中緬文協”、“東方文協”等組織機構及其《中國作家》、《東方呼聲》、《東方使者》、《現代中國》、《戰時中國》、《中國通訊》、《中蘇文化》等報刊，還有編輯出版《中國抗戰小說選》等抗戰文集，掀起了抗戰文學“走出去”與“請進來”的高潮，使得大後方文學和解放區文學在世界上得到了廣泛傳播與接受，產生了良好效果。在此時期，除了靜態的、紙質的中國抗戰文學文本的譯介外，動態的、立體的中國抗戰文藝也走出了國門，登上了世界舞臺。比如，1944年中國抗敵演劇五隊赴緬甸演出，給緬甸反法西斯的英勇人民送去了《國家至上》、《金玉滿堂》和《渡黃河》等劇目，鼓舞了他們的鬥志。

在冷戰環境下，中外文學接觸和交往遭遇了寒冬。尤其是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開始的極左政治風潮中，有的文人因此而受到了各種名目的政治迫害。比如，文革期間，劉錫誠和他夫人馬昌儀因爲與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之間的交誼，被定“裡通外國罪”，吃盡了苦頭。更有甚者，當年，有人居然還把當代中國發明的所謂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帽子戴到了外國人的頭上。“野間宏先生對中國感情很深，一直關注中國的發展。早在1960年，他就率領日本文學家代表團到中國訪問，結識了茅盾、周揚、巴金、冰心、張光年、劉白羽等作家，受到毛主席、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的接見。可是後來，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他的老朋友都變成了‘牛鬼蛇神’、‘反革命’，有的含冤而死。在那政治帽子橫飛的年代，竟然有一頂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帽子，漂洋過海，扣到了野間宏的頭上。他笑著說：‘中國雜誌上有一篇文章說我是反革命，還是修正主義，兩大罪名，挺嚇人的……’^⑪

“文革”結束以後，中外文學接觸和交流再度進入良性互動狀態，在境外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活動，大力推動中外文學接觸和交流。比如，“在1981年魯迅誕辰100周年之際，法國舉行了一系列紀念活動。9月21日，中國駐法國使館舉辦了魯迅電影招待會。放映了影片《傷逝》。12月5日，巴黎專賣中國書刊的鳳凰書店舉辦讀者座談會，來自法、德、意和中國的六十多名魯迅

研究者出席座談會，與讀者交流閱讀魯迅作品的體會。12月5日晚，法中友好協會和巴黎第八大學‘魯迅研究中心’共同組織了紀念魯迅誕辰100周年晚會，晚會在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舉行，與會者有兩百多人，米歇爾·露阿介紹了魯迅的生平和創作情況，意大利學者安娜·布雅蒂作了《論魯迅的詩歌》的報告，德國學者顧彬作了《魯迅筆下的中國女性》的報告。12月6日，法中友協馬賽分會舉辦魯迅誕辰100周年紀念晚會”。^⑨又如，1988年5月至6月，法國文化部邀請阿城等12位中國作家赴法，參加旨在促進譯介外國文學的、名為“國外美人”的文學活動，活動結束後出版了這些作家作品的法譯小說集《重見天日》。還如，2000年3月，張煒、蘇童、李銳、賈平凹、高行健、韓少功和北島出席巴黎中法作家和法國中國學家研討會，會後出版會議論文集《中國文學——過去與當代寫作：漢學家和作家互看》。再如，2001年12月，莫言、余華、楊煉、蔣子丹、韓少功、格非、陳思和、戴錦華、白先勇、李昂等參加巴黎中法作家和批評家研討會，會後出版會議論文集《為現在而寫：中法文學的辯論》。最後如，作為“2003~2004中法文化年”的活動之一，中國派出莫言等知名作家赴法出席法國年度圖書交易會，在一週時間裡，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法譯本就賣出了15,000冊，由此可見中國作家的出訪活動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國際傳播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中國政府對於小說家“走出去”尤為傾心，因為小說家的文體最利於“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其實，比起小說家、散文家和戲劇家，在新時期中外文學接觸和交往中，中外詩人之間的接觸和交流往往是最活躍的。新時期以來，中國詩人尤其是中國先鋒詩人與西方文學界、中國學界的接觸與互動十分頻繁，無形之中強化了中國先鋒詩歌在西方傳播與接受的廣度和力度。奚密說：“八十年代以來，一方面許多歐美學者和作家訪問過中國，許多人在這裡講學、生活。常見的情況是，透過中國同事或學生，他們接觸到當代詩歌。一旦產生了興趣，他們著手翻譯，而且通常是採取合譯的方式。另一方面，現代漢詩史上，第一次有那麼多的中國詩人來到西方。這不僅限於所有代表性的朦朧詩人（如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楊煉、芒克等），即使新生代和更年輕的詩人（如翟永明、于堅、孟浪、西川、張真、臧棣、張耳、顏峻、王敖等），也有很多機會到海外參加詩歌朗誦會和詩歌節，擔任駐校作家，留學深造，或為了其他個人的理由。其中不乏長期定居在國外的詩人。”^⑩就連中外文學交流的“盲區”，比如印度，中國當代詩人都有所涉足，並且取得了可人的成果。2009年2月13日，北島、歐陽江河等抵達印度，與以亞西斯、南地為首的九位印度學者、作家和詩人舉行了為期三天的會議。“在這三天裡，中印兩方的與會者不僅對文學、政治和歷史等領域中的很多話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而且還舉辦了多場詩文朗誦會。雖然遇到了很大的語言翻譯上的困難，但詩人和作家們心有靈犀，發現彼此溝通並不困難。千百年的時間距離，千萬里的空間阻隔，這時候化為烏有”。^⑪

近年來，除了中國作家詩人走出去在海外開展交流對話外，正如上面奚密所說，國外作家詩人也紛紛來到中國訪問，盼望著與中國作家詩人進行交流對話。比如，2006年7月，作為對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的回訪，敘利亞作家代表團來華訪問。團長哈桑·哈米德是巴勒斯坦人，著名小說家。他說：“我從小就嚮往中國，對中國充滿敬意。當時在難民營裡能看到阿文版的《中國畫報》，很便宜，小孩用零用錢就買得起。我每期都買，看完後，就把裡面的風景照片剪下來，貼在床頭，看也看不夠。中國的天安門、長城、故宮，在我的心裡扎了根，常常在夢中出現。當我啓程來中國時，高興得忘了刮鬍子。我自以為瞭解中國，但看了北京、上海、蘇州，還是感到震驚，沒想到建設得如此之好，如此輝煌。我到過許多國家，但中國的城市比一些歐洲城市還美。中國

人民的勤勞、勇敢、智慧、創造力，和平友好的精神，令人欽佩。我是帶著問題來的，想與中國作家探討創作與生活的關係，創新與傳統及外來文化的關係，在經濟高速發展中文學的作用和意義。”^⑧又如，2010年5月21~22日，印度作家來華，在北京西郊臥佛山莊與中國作家進行了兩場對話，對話的具體內容發表在《今天》2010年秋季號上。這次活動是對先前中國詩人訪印的回訪。正是這些友善的你來我往、禮尚往來，促進了中外文學的交匯、共融與互生。中外詩人之間的接觸和交往，儘管也有一些政府特意的安排，但主要是民間自發的、藝術的、學術的行為。

其實，中外文學接觸和交往一直處於意識形態化與去意識形態化的矛盾中。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期間，中國作家在法蘭克福大學歌德學院會場、在法蘭克福文學館的“中國文學之夜”等地開展了一系列的演講、朗誦和對話活動，莫言、余華、蘇童、劉震雲、李洱等人的講演或對話非常火爆。雖然中國現當代文學與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關係的問題依然是國外記者、讀者，乃至部分中國學家感興趣的話題，但中國作家總是能機智地、有策略性地予以應答。除此之外，也有些讀者、作家和中國學家開始放棄政治意識形態視角，轉而從文學藝術本身的角度與中國作家展開真誠的對話。此次書展期間，莫言與德國作家馬丁·瓦爾澤進行的對話和溝通就很“專業”。“德國作家馬丁·瓦爾澤就曾在讀完《紅高粱家族》之後評價說，這部作品與重視思辨的德國文學迥然有異，它更多的是在展示個人精神世界，展示一種廣闊的、立體化的生活畫面，以及人類本性的心理、生理感受等。莫言得到這些反饋信息後感到很欣慰。他認為，這首先說明作品的翻譯比較成功，其次國外的讀者、同行能夠拋開政治的色彩甚至偏見，用文學藝術以及人文的觀點來品讀、研究作品是件很讓人開心的事。他希望國外讀者能以文學本位的閱讀來體會中國小說”。^⑨

但是，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種嚴峻的現實，那就是，有接觸、有交往並不一定總是意味著會有深入的交流。種種內在與外在因素之間的鬥爭，往往會導致海外中國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矛盾性接受。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史與接受史上，曾經出現過中外作家有了友好交往後仍然出現一時的誤判、誤讀、隔膜的現象；當然，有的中國學家隨後又能排除干擾，重新回到擁抱現代中國作家作品的軌道上來。日本的中國學家辛島驍就是這方面的典型案例。1926年，經他的岳父，即以《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名世的著名漢學家鹽谷溫（節山井）介紹，辛島驍在北京初識魯迅。1929年，在上海他又見到了魯迅。因為辛島驍來中國訪問魯迅的緣由是“佩服那部《中國小說史略》”，“要向作為學者的魯迅表示敬意”，^⑩所以，這段時間，辛島驍對魯迅充滿了“同情的理解”。他坦言：“具有新人稱號的、受到舉世歡迎和崇拜的他，體會到了流落廈門、廣東的寂寞，回到上海之後，又被新興的左翼青年敲打，他即使還懷有不曾改變的抱負和熱情，也逐漸感到了身邊的秋意。”^⑪辛島驍的這段詩意的文字，凸顯了魯迅當年在國內左翼文學界所受到的誤解、“敲打”，以及由此產生的寂寞、孤獨和痛苦。可以說，寫下這段文字時的辛島驍是瞭解、同情、支持魯迅的。但是，隨著中國左翼文學界展開對魯迅等“五四”老作家的批判，如阿英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等，受這股激進主義風潮的影響，辛島驍也“跟風”指責魯迅的“落伍”。他說：“然而，魯迅啊，你要去向何處呢？你的世界已經行不通了。孔乙己和阿Q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世界性的下一個時代，也就是即將到來的時代，將對你不宣而至了”。^⑫好在這種革命風潮對他的影響並不很深，與他對魯迅精神——民族魂——的景仰相比，微不足道。“正是由於這樣，辛島驍在後來的二十年間，所以關心中國現代的革命動蕩，可以說是從魯迅身上受到了深刻影響的結果。過去，他關心過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也讀過一些作品，這是從一位日本漢學青年的天真的叛逆精神出發的，但從看到了魯迅的神情以後，從以不同的態度去鑽研。

正由於這樣，當內山邀請他赴宴，最後一次見到魯迅的背景時，便情不自禁地說：當時，自己‘好像一個幼兒園的孩子，從阿姨的後面咬著她的頸脖子，叫一聲老師似的’，曾‘為一種衝動所支配，想要把感情一口氣吐出來，從後面抱住他’。”^②與後來成為“滿洲國”的“導演者”而走向日本軍國主義的岳父不同，辛島驍始終理解、同情、支持中國革命。同樣是中日文學家之間的交流，莫言與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之間就很有默契。2002年，一家電視臺拍攝莫言的紀錄片時，特地邀請大江健三郎去高密；他們倆深談了十幾個小時。大江健三郎十分推崇莫言。他曾說：“21世紀的文學就是屬於像莫言這樣的中國作家”，“要是讓我來選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我就選莫言”。^③2006年，大江健三郎訪問中國時，在中國作家協會招待晚宴結束時，送給每位在座的中國作家他的《愁容童子》或《我在曖昧的日本》中譯本，留給莫言的贈言是“你是我可怕的競爭對手，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人們常常以為，導致偏見和貶低性“俗套”產生的原因是，處於競爭狀態中的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缺乏一定的接觸。所以，有不少人主張，只要增加不同文化群體彼此間的接觸，通過這些頻繁的接觸，“就應該把對方持有的偏見與現實進行對照，並且因此糾正這種偏見”。^④但是，也有人對這種樂觀的“接觸預想”提出了質疑，認為“僅僅依靠接觸是很不夠的，而且交往也從來不是一種中立性質的行為，與他人的關係總是被一種先在的意象制約”。^⑤事實證明，世界上許多不同文化並存的國家和地區，雖然他們彼此間的文化交往不斷，但是他們之間的種種文化衝突和對峙局勢未見緩和，有時反而更加劇烈了。畢竟在頻繁的交往中，信息的過量攝入有時也會造成混亂。這就表明，不同文化群體之間，尤其是處於衝突狀態的文化群體之間，要想消除固有的偏見和“俗套”，最終能夠進行真正平等意義上的交流和對話，僅僅憑藉彼此間的社會交往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立足長遠，致力於改變某些根本問題，如彼此間文化融通的問題，心理與人格溝通和理解的問題。當然，我們反思不同文化之間的社會接觸與文學交往，目的不是要否定或者貶低它們的作用，而是要深究它們的有效性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交流，除了作家之間的交流外，最理想的還是文學作品之間的交流。

三、中國現當代作家海外獲獎

文學的海外獲獎，是文學在海外獲得廣泛而深入接受的集中體現。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在海外獲獎，至少部分地說明了這些獲獎作家、作品已經走出了國門，走進了海外文學圈，並獲得了不少海外專家和讀者的首肯與贊譽。當然，這裡必須澄清的是，海外授予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獎勵的情況不盡相同，總體來說，大約有以下四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授予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本身的。比如，巴金1982年獲得意大利但丁學會頒發的“國際但丁文學獎”，1983年獲得法國榮譽軍團獎章；又如，2003年賈平凹獲得法國文化交流部頒發的“法蘭西共和國文學藝術榮譽獎”，法國駐華大使在給賈平凹的賀信中說：“您的作品在法國影響很大，這項榮譽是授予您作品內容的豐富多彩性與題材的廣泛性”；^⑥還如，2004年莫言、李銳和余華獲“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以及王蒙獲意大利蒙德里安文學獎、日本創作學會和平與文化獎、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榮譽博士學位，等等。

第二種情況可以說是授予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譯本的。比如，葛浩文翻譯的部分中國當代小說在海外獲獎，更多的原因恐怕還是他本人的譯本在海外有著良好聲譽的影響，也就是說，是翻譯家本人的“聲譽資本”在發揮主導作用，比如，2007年他翻譯的姜戎的《狼圖騰》，2009

年他翻譯的蘇童的《河岸》，2010年他和妻子合譯的畢飛宇的《玉米》，均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曼布克獎”）。恰恰是因為他的翻譯以及這些譯本在海外的獲獎，反過來給這些中國作家帶來了廣泛的聲譽。

第三種情況是受到不同意識形態左右的授獎。比如，1939年12月20日，根據蘇聯人民委員會決議設立“斯大林文學獎”，專門獎給那些在無產階級文學領域取得杰出成績的作品。當年，斯大林除了親自審查獲獎作品和確定獎項外，有時還專門下達創作提綱，處處體現當時世界無產階級陣營“老大”的政治意志。蘇聯的文化權貴、被稱為“受斯大林寵愛的作家”的西蒙諾夫六次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那年頭，在蘇聯，斯大林文學獎榮譽的背後是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殘酷博弈。1951年，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二等獎，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賀敬之、丁毅執筆的《白毛女》獲三等獎。這些作品的海外獲獎，一度給這些中國作家帶來了榮耀，同時在社會主義國家掀起了譯介和研究的熱潮，但是這種榮耀也因中蘇關係交惡而烟消雲散。不僅如此，有的作家還在隨後的極左運動中受到批判，如1955年丁玲被定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成員；1957年又被定為“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成員；劃入“右派”後，丁玲下放北大荒、投入監獄等。

第四種情況是多種因素兼而有之，難以說清楚到底是作家本人的因素、原著中思想藝術因素、翻譯版本的因素還是意識形態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1998年余華的《活著》獲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2002年獲得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2004年《許三觀賣血記》獲美國巴恩斯－諾貝爾新發現圖書獎，2008年《兄弟》獲法國首屆“國際信使外國小說獎”。又如，1988年賈平凹的《浮躁》獲第八屆美國美孚石油公司“飛馬文學獎”，1997年《廢都》獲法國“菲米娜外國文學獎”，等等。當然，最重要的是還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關於這點，我曾在《莫言小說的海外傳播與接受》裡談到：“通過海外中國學家的譯介與研究，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強勢推廣，影視劇改編和市場經濟等‘合力’的共同作用，莫言小說在海外得以廣泛流佈……並且在內外多種制約性因素的影響下，發生了意識形態接受、思想接受、哲學接受、美學接受和文本接受，極大地豐富了莫言創作的意義。”^③

總體來看，由於中外文學交流在1949年以後遠比之前頻繁得多，所以此前中國現代作家作品海外獲獎很少，而1949年之後，尤其是新時期以來，隨著中外文學交流日盛，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在海外獲獎就逐漸增多了。中國作家在海外獲獎，必然會增加他們在海外的知名度，有利於他們的作品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但是，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在海外獲得各種文學獎項這一事實，只能表示海外對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某種程度的認可與親善，並不能因此說明它們就已經融入海外的文學系統了，更遑論其對海外文學創作的題材、結構、語言，乃至審美有什麼實質性的影響。比較起中國現當代文學所受的西方文學影響來，我們對它們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我們只有修煉內功，才能最終通過優秀的文學作品發力，給它們以影響，最終方能真正自立、自強於世界文學之林。

概言之，作為“外部”的助力，“中國熱”、中外作家交流以及中國作家海外獲獎，共同促進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然而，中國作家作品海外譯介却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海外產生持久影響力的最內在、最本質的源泉。因此，在以後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譯介、傳播與接受過程中，我們需要更有力度，更具理性，著力避免可能出現的政治誤讀，使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健康地、有序地、可持續地發展。

- ①Karl Dedecius. *Vom Übersetzen Theorie und Praxis*.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suhrkamp taschenbuch 1258), 1986, p.13.
- ②郝平、張西平：《樹立文化自覺，推進國際漢學研究》，錢林森編：《法國漢學家論中國文學——現當代文學》，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10~11頁。
- ③張弘等：《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國作家與中國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1頁。
- ④⑤北島：《藍房子》，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11~12、23頁。
- ⑥⑦⑩奚密：《現代漢詩：翻譯與可譯性》，《“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摘要彙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2011年4月自印，第16頁。
- ⑧⑨⑱劉江凱：《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寫作——莫言的海外傳播與接受》，瀋陽：《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4期。
- ⑩胡燕春：《中國現當代小說在美國的傳播與研究》，哈爾濱：《黑龍江社會科學》，2011年第5期。
- ⑪衛茂平、馬佳欣、鄭霞：《異域的召喚——德國作家與中國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8頁。
- ⑫“文協”出版部：《出版部報告》，重慶：《抗戰文藝》，1941年第7卷，第2~3期合刊。
- ⑬《阿特麗女士歡迎小記》，重慶：《抗戰文藝》，1938年第2卷第4期。
- ⑭⑰陳喜儒：《中國魅力——外國作家在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204~205、48頁。
- ⑮王家平：《魯迅域外百年傳播史1909~200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15頁。
- ⑯編者按：《中印作家對話專輯》，香港：《今天》，2009年秋季號。
- ⑰⑱轉引自熊融：《魯迅與日本漢學家辛島驍》，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資料》第13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5~376、377~378頁。
- ⑲⑳辛島驍：《論中國的新文藝》，陸曉燕編譯《日本魯迅研究史料編年（1920-193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2、113頁。
- ㉑轉引自蘭亭亭：《西方傾倒於莫言說故事天分》，北京：《中華讀書報》，2004年6月23日。
- ㉒㉓呂特·阿莫西、安娜·埃爾舍博格·皮埃羅：《俗套與套語——語言、語用及社會的理論研究》，丁小會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頁。
- ㉔轉引自《著名作家賈平凹獲法文學藝術榮譽獎》，<http://book.sina.com.cn>，2003年7月1日。
- ㉕楊四平：《莫言小說的海外傳播與接受》，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3年第1期。

作者簡介：楊四平，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詩學研究中心近現代詩學研究室主任。安徽蕪湖 241002

[責任編輯 桑海]